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

王庆成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太平天国的历史翻思想

王庆成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王庆成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ISBN 978-7-300-11886-4

- I. ①太…
- II. ①王…
- III. ①太平天国革命-研究
- IV. ①K25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6938 号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
王庆成 著
Taipingtianguo de Lishi he Sixia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39.75 插页 2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621 000	定 价	6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波澜壮阔，学术研究的发展自成一景。对当代学术成就加以梳理，对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做一番披沙拣金、择优再版的工作，出版界责无旁贷。很多著作或因出版时日已久，学界无从寻觅；或在今天看来也许在主题、范式或研究方法上略显陈旧，但在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或历时既久，在学界赢得口碑，渐显经典之相。它们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再版的价值。因此，把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大的学术系列集中再版，让几代学者凝聚心血的研究成果得以再现，无论对于学术、学者还是学生，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披沙拣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人文学科的学术著作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我们只能根据专家推荐意见、引用率等因素综合考量。我们不敢说，入选的著作都堪称经典，未入选的著作就价值不大。因为，不仅书目的推荐者见仁见智，更主要的是，为数不少公认一流的学术著作因无法获得版权而无缘纳入本系列。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分文学、史学、哲学等子系列。每个系列所选著作不求数量上相等，在体例上则尽可能一致。由于所选著作都是“旧作”，为全面呈现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变化，我们一般要求作者提供若干篇后来发表过的相关论文作为附录，或提供一篇概述学术历程的“学术自述”，以便读者比较全面地

了解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至于有的作者希望出版修订后的作品，自然为我们所期盼。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殷切期望新出现的或可获得版权的佳作加入。弘扬学术是一项崇高而艰辛的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园地上辛勤耕耘，收获颇丰，不仅得到读者的认可和褒扬，也得到作者的肯定和信任。我们将坚守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出版使命，为中国的学术进展和文明传承继续做出贡献。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的策划和出版，得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学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我们同样热切期待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厚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序*

1955年春天，在南京太平天国史料编纂委员会工作时，我接到王庆成同志来信，他问我们编纂的资料目录已经公布了一年，何以至今未见资料出版。从来信中，我知道他是一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工作的青年，爱好太平天国史。我回信告诉他，经中国史学会决定，先出太平天国本身文献，反面资料暂时不宜刊出，所以未印。后来我接到通知，王庆成同志不同意这个决定，并向有关方面反映。中国史学会采纳了他的意见，太平天国反面资料得以刊行。那时候，王庆成同志以一个青年人对国家科学研究事业就如此关心，这使我从开始认识他就敬重他。

1957年我在北京医病，他来看我，和我讨论太平天国史。从交谈中，我看出他曾对太平天国史下过工夫。我感到一个青年人能够以业余时间，刻苦钻研，坚持不懈，是十分可贵的，向他表示了我的钦敬。1957年，他调到《新建设》杂志编辑部工作。因业务关系，我们常有联系。到1977年，他调到近代史研究所，同在一个单位，更时相切磋。我认识王庆成同志27年了。他是我认识的同志里第一个以业余研究而有卓越成就的太平天国史专家。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做的是理论宣传工作，在《新建设》杂志编辑部做的是编辑工作，在1975年至1977年间还由文物出版社借调做文物工作，调到近代史研究所后，初任资料编辑室副主任，旋任政治室副主任，再升经济室主任，做的都是领导工作。这些工作，不曾妨碍他研究太平天国史，反之，给他从纵深方面开展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予以培养。王庆成同志正是因为能够很好地解决理论锻炼、业务锻炼和研究锻炼而成为取得卓越的太平天国史研究成就的史学家，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向他学习的。尤其是今天提倡“自学成才”，他更是

* 本序是罗尔纲先生为本书1985年版所作。



年青一代的同志们学习的典型。

王庆成同志是个心细思精的人。古人说：“文如其人。”同样也可以说：“研究如其人。”王庆成同志在他的研究中充分发挥了他这个天分。他心细如发，观察入微，又能从微知著。他细微的功夫，不亚于我国古代的经师。但那些人，一般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看不见泰山。在研究工作中，我们知道，要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只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才能做得到。王庆成同志既“明足以察秋毫之末”，又从“秋毫之末”看见了泰山。这正是他理论锻炼深到的功夫，使他超越了古人。在本书《圣神风、圣神电的历史和意义》一篇，他抓着了“圣神风”、“圣神电”这些别人忽视的微细地方，然而正是反映太平天国历史事实的重大地方，进行分析，进行有关的联系，丝丝入扣地道出太平天国的重大历史，特别是后期历史，这是其中最精密的一篇。

现在，王庆成同志把二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编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一书。我学习后，感到了下列几个特点：

(一) 对有关太平天国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例如关于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关于金田起义的事实和过程、关于建都问题的论争及其影响、关于太平军的编制制度、关于儒家、墨家同太平天国上帝的关系等，作者都在独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看法。据我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体会，对历史的认识是不断深入的过程，只有不断深入，才能使太平天国史研究兴旺发达，不断发展。作者提出的许多新看法，不一定都正确，不一定都为大家所同意，但对于推动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这些看法，已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并产生了影响。

(二) 开阔了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领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等。特别是关于太平天国的宗教，本书有十一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探讨，扩大了对太平天国、对洪秀全研究的范围。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我在30年代就认为是一次农民革命；后来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它的农民革命性质判断，并不是要否认太平天国宗教的存在，而是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它的实质和作用。近年来，作者经常提出要开阔视野，丰富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课题，本书关于太平天国宗教的研究，可说是他身体力行的结果之一。还可以提出的是，作者不是单纯地就宗教谈宗教，而是力图通过对太平天国宗教的分析来认识太平天国的思想



和历史，这也是作者研究方法的一个特色。

（三）重视理论思维，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历史研究。研究历史必须首先搞清事实。本书有一些文章主要是对史事的稽考，还有一些论文也包含了考订史事的内容，这说明了作者对澄清史事的重视。但通观全书，许多研究课题都贯串着重视理论分析，重视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思想，即使在对史事的稽考中，也较多地注意事物间的联系。这是本书的一个特点，也是作者的研究工作取得卓越成就的基本原因。作者近年来注意学习和总结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历史经验，对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和方法问题，对于太平天国史研究如何继续前进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见解。这些见解和作者在研究工作中发挥理论思维作用的经验，都是值得重视的。

上面这三个特点，是我学习后的感受。庆成同志要我写篇序文。序文我是不敢当的，谨把我对他的一些认识，和我学习他的大著后的观感写了出来，以供同志们读本书时作一点参考。只是我识浅学疏，说的不对，敬请读者教正！

1982年8月10日罗尔纲谨序于北京

目 录

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	1
“拜上帝会”释论	33
金田起义记	
——关于它的准备、实现和日期诸问题	51
壬子二年太平军进攻长沙之役	128
太平军内部对建都问题的论争及其影响	150
《太平军目》和太平天国军制	169
太平天国的“旗制”	189
儒家、墨家和洪秀全的“上帝”	215
太平天国的“天”和“上帝”	226
太平天国对“上帝”的称谓及其来源	230
太平天国的一神论——一帝论	235
太平天国的天堂、地狱和赏善罚恶	242
太平天国的“魔鬼”	251
圣神风、圣神电的历史和意义	265
“太平玉玺”的读法	276
关于“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	285
太平天国“上帝”的大家庭和小家庭	293
太平天国后期铨政紊乱的原因	316
壬戌十二年石达开的招兵告示和行军活动	322
石达开大渡河覆败事实	332
太平军和捻军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357
太平天国的传说和历史	372
关于洪秀全族谱	386
访问金田、紫荆	396



“王四殿下”不是杨秀清	416
《天情道理书》戊午遵改本	420
辨石达开“伪造”密诏	425
释“妄为推测有何益”	427
“嗣君”及其他	430
洪仁玕绝命诗	434
李秀成评价和忠王府存废	438
《镇江见闻录》别本中的新史料	442
日本发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	444
英国发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及其价值	446
对太平天国革命的一点认识	467
怎样认识太平天国的反封建性质	
——驳梁效、罗思鼎对太平天国历史的歪曲	470
太平天国研究中的新问题	488
太平天国研究的历史和方法	492
《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及其澳藏原刻本	514
洪仁玕等亲书自述诗文中的史事	
——原题自述诗句随记	522
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贵福等亲书自述诗文	526
海外所藏太平天国文献叙录	528
幼天王、干王等未刊供词中的新史料并辨证	567
我和太平天国研究	613
后记	621
后记之后	622
再版后记	623

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

洪秀全的思想，特别是他的早期思想，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兴起以及它的性质、面貌，有很密切的关系。三十年来，前辈史学家范文澜同志在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国近代史》等重要著作中，以及其他研究者在各种论著中，都对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和他发起太平天国革命的历程有所分析论述，得出了一些共同的结论，形成了一些惯常的看法。他们的成果，为后来者的继续探索，奠定了一个基础。本文就是试图在这种基础上，提出和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洪秀全究在何时和怎样转变到立志进行反清革命斗争？基督教对他的早期思想起了什么影响？他是否只是借用了“上帝”这个名词来发动革命？他的早期著作是否宣传了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思想？等等。简言之，就是试图对金田起义以前洪秀全的思想基础作一研究。

对历史的正确认识来之不易。客观上，它受到历史资料的限制；主观上，研究者除了认识能力有高下之外，视野还不免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因而，对历史的认识，总是一个过程。本文对洪秀全早期思想中一些问题的探讨，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希望能对这种认识过程的前进有所助益。

一、1843年以前的洪秀全及其思想

洪秀全于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1814年1月1日）^①出生于广东花县一个农民家庭，自幼接受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教育。据同他“巷里相接”的族弟洪仁玕的忆述：“童年的洪秀全学习

^① 许多历史资料都用阴历纪时，而且往往纪月而不纪日，如勉强以公历推算，反不准确。为区别起见，本书凡以汉字标年月日者，指阴历；凡以阿拉伯数字标年月日者，均指公历。嘉庆十八年大致相当于公元1813年，所以用公历来计算洪秀全虚岁时，都以1813年起算。



能力发展很突出，七岁入塾读书。五六年间，他已学过并能背诵‘四书’、‘五经’、古文和《孝经》；后来他自读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的一些较奇特的书。所有这些，他初读以后，即能了解。”^①由于他的学业优良，家庭对他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很快，他得到了老师和亲属的喜爱，他们以他的才学而骄傲，确信他将及时取得功名，甚至成为翰林——皇帝就是从翰林院选拔高级官员的，这样，整个家族也将因他的高位而得到荣耀。”^②

大约从十六岁以后直到三十一岁，即从1828年至1843年的十五年间，洪秀全的经历主要是两项：应科举，做塾师。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般读书人的寻常经历。

在这十几年间，洪秀全应科举的具体情况究竟怎样？这方面的历史资料不很充分。据洪仁玕忆述：

洪秀全的家庭对他的文才抱有很高的期待。在早年，约在仅有十六岁时，洪秀全就带着实现这种期待的希望，开始参加在广州的考试。

县考时，秀全的名字在榜上总是名列前茅，但他从未能得中秀才。^③

按照清朝的制度，童生考秀才，须经过县、府、院三级考试。县考要试五场，第一场被录取，即有府试的资格；但只有终场时的第一名才称为“案首”，“院试时相沿取以入学”^④。洪秀全十六岁那年应试，县考虽“名列前茅”，但看来并不是“案首”，这一年的府试或院试，他失败了。

洪秀全十六岁应试不中，即在家参加辅助劳动，不久受聘为塾师。其后，又有继续应试之记录：

1836年，秀全二十三岁时，他再次去广州应试。

下一年，1837年，他再次去省城应考。开始时，其名字在榜的前列，但后来又在榜的后列。^⑤

① 《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二节，见《太平天国》，第6册，“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据燕京大学图书馆1935年重印的1854年英文原本 *The Visions of Hung-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 校改了译文。

② 《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二节。据英文原本校改了译文。

③ 《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三节。据英文原本校改了译文。

④ 商衍鎤：《清代科举考试述录》，5页，北京，三联书店，1958。

⑤ 《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三节。据英文原本校改了译文。

落第的童生再次应考，每次都要从第一级考试县考做起。^① 洪秀全这两次去省城前，必然又经历了县一级考试的磨炼。在府试中，第一场录取就可以应院试。院试主要是两场，一正试一复试。这里说洪秀全开始时名在前列，后来又在后列而落第，看来是院试未能通过。

在 1837 年这次落第后，洪秀全连续卧病四十多天。病后，“此时他仍再赴广州应试，并跟过去一样，在距本乡八哩的一所学校里任教师数年”^②。洪仁玕在后来的“自述”中曾概述洪秀全应考之事说，洪秀全“十二三岁经史诗文无不博览。自此时至三十一岁，每场榜名高列，惟道试不售，多有抱恨”。洪秀全三十一岁，正是 1843 年，这是洪秀全的最后一次应试。^③

这些记录说明，洪秀全在 1843 年以前曾多次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洪仁玕明确提到洪秀全去广州应府、院的考试就有四次^④，而在每次去广州以前，他又须先在花县应考。人们知道，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以巩固其统治的一种方法。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社会中下层的少数知识分子得以跻入统治者的行列，因而众多的知识分子深深地被这一制度所牢笼。洪秀全多次参加了这种考试，这一基本的经历，表明了这段时期的洪秀全不可能有推翻清朝、矢志革命的思想。

然而，也有历史资料记载了洪秀全 1837 年广州应考落第回家途中作了这样一首诗：

① 只有经院试取为俗生者（略相当于备取生），下次应试可免县、府两级考试而径直参加院试。参见章中如：《清代考试制度》，上海，黎明书局，1931。

② 《太平天国起义记》第四节。据英文原本校改了译文。

③ 参见《太平天国》，第 2 册，847 页。道试即院试，清代各省学政原称学道。洪秀全最后一次应考是在哪一年，另有不同的说法。[新西兰]麦沾恩著、胡簪云译《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上海，广学会，1931）一书第十四章说，洪秀全在 1847 年第三次府试落榜后去拜访罗孝全。经查 G. H. McNeur *China's First Preacher Liang-Fa* 原文，“第三次”应作“又一次”。又，萧一山《清代通史》引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洪仁玕另一份供词中有洪秀全“考到三十四五岁”之句，洪秀全三十五岁为 1847 年。据此，洪秀全似于 1847 年春又一次应考。但洪秀全 1847 年春去广州系应召去罗孝全处学道，洪仁玕陪同前往，洪仁玕在 1852 年向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的述词完全没有提到此次去广州有应考之事。本文从 1843 年为最后一次应考之说。

④ 洪仁玕的这些叙述，也有值得进一步推究之处，如据清朝定制，童试三年两考，丑、未、辰、戌年为岁考，寅、申、巳、亥年为科考。1836 年为丙申年，是科考年；而 1837 年丁酉，并非岁考年。因而有人认为不存在洪秀全 1837 年去广州应考之事。但实际上是有例外情况的。如遇上“恩科”时，就会以岁考作科考，乡试后再举行一次科考。所以广州在丁酉年有一次童试，并非不可能之事。国外有学者在论说洪秀全不可能 1836、1837 两年接连去广州应考时说，这“显违三年一次定例”。按此实有误解。三年一次是乡试，童生考秀才才是三年两次。



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
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①

还说洪秀全在这次回家以后病中作了这样一首诗：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
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
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②

这些诗句，充满了对于清朝统治的反抗情绪和洪秀全胸怀大志、要成就帝王之业的抱负。它们往往被认为洪秀全产生反清革命思想的起始。

但是，如果我们正视洪秀全本人的上述实际经历，对于资料中的这种记载和据以作出的论断，不能不提出怀疑。

研究洪秀全的这些诗句，首先必须注意它们的来源和被宣布时的环境。人们知道，洪秀全在 1837 年落第回家的病中有过种种异象异梦。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是假装的。^③ 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确定，当洪秀全后来立志发动革命以后，在太平天国立国以后，对于这次卧病和病中所见异象的记述，就有了许多附加的成分，大大地夸大了它的事实和意义。关于洪秀全在 1837 年病前和病中的上述两首诗，其真实性极可能受了后来突出神化洪秀全的异梦异象这种政治作用的影响。事实上，被认为属于洪秀全早期的某些言论、思想，由于后来的政治作用的需要而被改动、增添，以至脱离事实真相、前后互有矛盾的事例，不在少数。例如，洪仁玕在 1852 年的记述说，洪秀全在 1845—1846 年时曾得奇梦，梦见红日在其手中，醒后乃作“五百年临真日出，那般燭火敢争光”等八句诗。^④ 这个梦和这首诗的政治作用是显然的。根据下面要研究的洪秀全在 1845—1846 年的基本思想，他不大可能在这个时期写这样的诗，洪仁玕 1852 年的这段记述已很不可信。然而不仅如此，洪仁玕后来在 1861 年所著《钦定英杰归真》一书中又进一步把此诗的写作时间提前到 1843 年洪秀全未拜上帝之时，并将首句“五百年临真日出”改为“天下太平真日出”^⑤。这当

① 《洪仁玕自述》，见《太平天国》，第 2 册，848 页。

② 《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三节。

③ 如果说洪秀全在 1837 年已有意装病以宣传符瑞受命一套，那就不能解释此后为什么还去考清朝的秀才。

④ 参见《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七节。

⑤ 《太平天国》，第 2 册，573 页。“五百年临真日出”，有继承朱元璋事业之意，改字后就完全掩盖了这一点。

然更不可信。又如,《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日》都说洪秀全1837年卧病凡四十余日,“自三月初一日升天,至送下凡时约四十余日”。但《钦定英杰归真》却说三月初四日鸟语喧哗、阴雨放晴,洪秀全吟“鸟向晓兮必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一诗,霍然病愈;而另一种太平天国的官书《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又是另一种说法,洪秀全三月初一日子时升天,越两日下凡,复于初三四日升天大战妖魔。这些升天、下凡的神话暂且不论,但所谓洪秀全在三月初四日写“太平天子事事可”一诗,却由此可见破绽,实为子虚乌有之事。这篇《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还记录了洪秀全1837年病中所唱的《十全大吉诗》十首。诗有许多隐语,至今我们还不能全部解释,但其中包括叫人民敬信上帝、洪秀全是真命天子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我们姑不论一个人在狂病中能否清楚地念出十首诗而被别人听得明白、记得确切,就是以诗的内容来说,这时洪秀全还没有接触基督教,还没有“看明天书”,怎么可能教人去信仰上帝?所谓1837年唱这十首诗,分明也是后来的编造。

这些事例说明,历史研究者在利用这类涉及洪秀全早期思想的材料时,应该十分谨慎。对于前述所谓洪秀全在1837年就写了那两首“龙潜”诗、“斩邪留正”诗的说法,也应作如是观。诚然,对于一个熟读经史,热衷功名的人来说,屡试不售的打击是巨大的^①,发出不平之鸣以至某种愤激之声是可能的。洪秀全如果当时的确有过这类诗句,其内容和词句与今天所见的这些诗句也必然有所差异。^②

^① 屡试不售无疑在洪秀全以及洪仁玕身上造成极大的精神创伤。后来,洪秀全刚刚起义开国,就在永安弹丸之地举行考试,建都天京后对科举考试极为重视,洪仁玕到天京的当年就举行“会试”等等,都可以看做补偿这种创伤的反映。

^② 洪秀全在1837年病中作“斩邪留正”诗一事,见于《太平天国起义记》一书。人们说,《太平天国起义记》是瑞典传教士韩山文根据洪仁玕在1852年的叙述和材料写成的,此时洪仁玕在香港,未参加太平天国革命,他只是客观地转述昔年亲耳听到的洪秀全讲述异梦的经过,并无神化洪秀全之意,因而《太平天国起义记》所记是可靠的。这似乎忽略了事情的发展变化过程。洪秀全1837年异梦的真正情况是一回事,金田起义前夕洪秀全为了发动起义的需要发展夸张了异梦的情节又是一回事。如下文将要讨论的,洪秀全在1848年冬“昭明”《太平天日》的故事,这个故事已经大不同于1837年的异梦了。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这时都在花县,经常见面商谈有半年之久。如果强调洪仁玕只是“客观”转述,不会“神化”洪秀全,那么,这个客观中必已包括了洪秀全的“主观”。至于说这首诗至迟在1854年已有流传,这与所讨论的1837年是否有这首诗并无关系。如果说有关,那倒是恰恰否定了这首诗是1837年病中所作,因为传抄者注说,这是“真主”洪秀全在花县水口庙题壁的诗(参见萧一山编:《太平天国诏谕》,北平,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1935)。总之,《太平天国起义记》是重要史料,研究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和活动必须充分利用它,但重要史料、第一手史料所记并不一定都是历史的真实,并不一定都可靠,否则,我们的任务就轻松多了。



洪秀全在 1837 年不可能形成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思想，这不仅根据他在这段时期中的基本经历，而且也根据他这年病中的其他言行。就在洪仁玕说他写了“龙潜”诗回家后，他的病发作了，他以为死日将至，对他的父母家人说：“我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我的生命快完结了。父母呵，你们对我的爱，我的回报是多么糟呵！我再也不能去获取功名以显扬你们了！”^① 这番话表达了洪秀全对不能成就功名以光耀父母的惭愧和遗恨，哪里有同时写出“龙潜”诗等诗的思想基础呢？^②

二、开始拜上帝并非开始革命

1843 年洪秀全最后一次应试落第以后，阅读了梁发的《劝世良言》，这是他接触基督教的开始。

关于洪秀全同基督教的最初接触，曾有研究者强调郭士立 (K. F. A. Gützlaff) 的作用。郭士立是普鲁士传教士，1831 年来华，曾参与英国侵华活动。《南京条约》签订后，1844 年，他在香港建立了一个中国人的宗教团体，名叫“汉会”，利用“汉会”成员深入内地传教，散发《圣经》和其他宗教宣传品。^③ 到 1850 年，郭士立的“汉会”所散发的《圣经》已遍及除甘肃以外的中国所有各省。^④ 由于郭士立在 19 世纪 40 年代这种广泛的活动，因而关于郭士立同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关系，早在太平天国革命初起时就有许多传闻。如罗孝全 (I. J. Roberts) 在 1852 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有人谓郭士笠先生的一位信徒已投入军中，但吾未想到此即洪秀全氏，更不以为其人已为革命领袖。”^⑤ 英国公使文翰 1853 年春访问天京后的报

① 《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三节。据英文原本校改了译文。

② 《洪仁玕自述》说“龙潜”诗是洪秀全 1837 年落第在回家船中所作。但《太平天国起义记》中洪仁玕曾提到洪秀全此次落第是雇轿回家。有人认为这与在舟吟诗之说有矛盾，因而把“龙潜”诗的写作时间放在 1843 年落第时。其实，就研究洪秀全早期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龙潜”诗的写作时间即使推迟至 1843 年，也是与这段时期洪秀全的基本思想、基本活动相矛盾。这样字句的“龙潜”诗，很可能出现于洪秀全做了天下真主以后以说明其“潜龙”时期志向。

③ 参见 E. P. Boardman, *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43 页, 1952。

④ 参见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253 页, 1929。

⑤ 《洪秀全革命之真相》，见《太平天国》，第 6 册，824 页。



告中说，太平天国“所习者确系故郭士笠博士之团体所印行之传道小册子”^①。近人有著作甚至说，洪秀全曾从郭士立学道，正式加入基督教^②；冯云山可能曾从郭士立受洗^③。应该说，关于洪秀全以及冯云山本人同郭士立的这种关系，是缺乏可靠根据的。郭士立的“汉会”成员或他们的联系者后来有参加“拜上帝会”的，郭士立译的《圣经》和写的传道书后来也有传入太平天国的，这是需要另行研究的问题。关于洪秀全同基督教的关系，他接触最早、早期思想所受影响最大的，可以确定，并不是郭士立或郭士立的作品，而是梁发的《劝世良言》。

梁发是广东高明县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生，幼年读过村塾，青年时做雕版工人，印刷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等译的《圣经》，后来受洗入教，被立为传教士。在19世纪前半叶，基督教的新旧教派都力图更深入地进入中国。一些到中国来的外国传教士，主观动机可能各不相同，客观上却总是配合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梁发同外国传教士关系密切。但他在英国侵略者大量输入鸦片的时期，曾写过一篇《鸦片速改文》，“劝人戒除吸食鸦片的恶习，语极痛切”^④。从宗教信仰上说，他夹杂有中国传统的佛、道信仰的残余，但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新教教徒，诚挚地迷信基督教的虚幻说教，也可以说他是受毒害的误入歧途者。^⑤

《劝世良言》是梁发所写的宣传基督教教义的书，初刊于1832年。全书九卷，包括九种小册子，但也有分为四卷、三卷者。它并不是系统地宣讲《新约全书》、《旧约全书》，而只是在六十几个互不连贯的小节中，摘引《新旧约》的某些片段，加以中国化的敷衍，反复宣传拜上帝、敬耶稣、反对拜偶像邪神和天堂永乐、地狱永苦

① 《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见《太平天国》，第6册，896页。

② 参见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165页，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0。

③ 参见 P. Clarke, *The Coming of God to Kwangsi*, 1973。

④ 《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97页。

⑤ 梁发有一段话表明了自己的心理状态：“神天上帝仁爱垂怜世人之极，而凡得知斯大道者，该凛然遵从之矣。而犹有积恶不肯猛然醒悟者……即被拘入地狱之中，永受苦祸矣。若遭着这苦祸者，甚难之至，哀痛之极也。盖世上算为最惨苦之刑罚，亦不能形容万分之一。因地狱的痛苦，没有了期之日。是以在生前不能回头改恶者，不如莫为人，宁可预先自受石磨慢慢磨死，免得死后更要受几十倍地狱之苦刑也。……今照经书奥义，略述此地狱永罚之大意，余心甚惶恐，下笔悚然，毛骨震动，忽生无限之忧，诚恐亦被自己恶欲所害，恐一时迷惑，复犯罪恶，岂不是将来亦要受此永罚哉！孰能可救之也？”见《劝世良言》卷二。凡本书以下所引《劝世良言》，均据1832年原刻本的影印本。